

让中国 走向世界

—中国国际战略60年

周俊成 吴康 著



Rangzhongguo
zouxiangshijie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让中国 走向世界

—中国国际战略60年

周俊成 吴康 著



Rangzhongguo
zouxiangshijie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让中国走向世界：中国国际战略 60 年/周俊成，吴康
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5
ISBN 978 - 7 - 203 - 06098 - 7

I. 让… II. ①周…②吴… III. 对外政策—研究—中国
IV. B8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7333 号

让中国走向世界：中国国际战略 60 年

著 者：周俊成 吴 康
责任编辑：高美然

出 版 者：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4922220 (发行中心)
0351-4922235 (综合办)

E-mail: Fxzx @sxskcb.com
Web@sxskcb.com
Renmshb@sxskcb.com

网 址：www.sxskcb.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太原市达益福利印刷厂

开 本：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13
字 数：33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203 - 06098 - 7
定 价：28.00 元

前 言

中国走向世界，不是改革开放以后，更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在近代世界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如何自立、自强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严峻的历史课题。对这一历史课题的探索也就开启了中国走向世界的历程。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使中国走向世界，近代以来，从农民阶级到地主阶级，再到民族资产阶级，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艰辛抗争使沉睡的中国猛睁开了眼看世界，但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却依然沉重而缓慢。随着中国共产党人登上历史舞台，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才开始变得轻快。从毛泽东、周恩来到邓小平，直到今天，一代又一代共产党在前人奠基铺路的基础上前行，并取得了划时代的突破和发展。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在维护独立、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制定了相应的战略和策略为民族求生存谋发展，国际战略就是这种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战略和战略研究中一笔宝贵但研究尚不充分的财富。作为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国际战略具有许多重要的特点和独特的风格。孜孜以求的强国梦想、灵活而现实的外交技艺、面向世界和未来的战略视野以及与大国和地区间交往的经验，在发展中国家中可谓独树一帜。通过分析中国国际战略的含义、发展演变、制定和实施的背景因素以及主要原则内容，充分了解和揭示近60年来中国走向世界的光辉历程，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一种认识和借鉴的视角。

中国走向世界——近代以来的民族梦想

中国走向世界，一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梦想。

在世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炮火、鸦片、商品、基督教等走向中国的同时，中国人也正努力用自己民族独特的方式走向世界。

虎门销烟的林则徐，不仅使侵略者们看到了中国人的尊严和爱国，而且更使西方人了解到中国的博大和辉煌。农民出身的洪秀全，不仅使西方传教士们了解到他对基督教的真实态度，而且还使西方人充分认识到中国人的勇敢和顽强。容闳、郭嵩焘、薛福成、郑观应、黄遵宪等人，不仅使东西方列强看到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而且也从他们身上领略到了中国人的积极进取和勇于开拓的精神风貌。危机感强烈的洋务派和维新派，则更以他们的智慧和言行向西方世界证明了中国人的务实精神和敢于接受挑战的坚强个性。

但是，这些先知先觉们受阶级、社会、时代和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太大，自身封建文化的积淀过于厚重，在面对西方世界强有力的冲击下，显得有些胆怯、自卑、保守和褊狭。尽管他们的言行在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艰难历程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严格来说，中国走向世界的作用、意义、方式和方法，在他们的思想意识里还很不明确。他们所起的作用，不是“有意栽花”的结果，而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式的效应。

与他们不同的是，孙中山不仅较早地清醒意识到“中国走向世界”的作用和意义，而且自始至终都把“中国走向世界”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他的一生与其说是革命和战斗的一生，还不如

说是为了中国走向世界而不断探索不断进取的一生。

知，常常是行的先导。行为的效果总是受知的制约。“世界走向中国”和“中国走向世界”，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演变的主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理解，也就自然地构成不同的历史观和世界观。许多人关注的是“世界走向中国”这一历史现象，忽视了“中国走向世界”这一深刻的历史主题。难能可贵的是，孙中山在思考世界走向中国这一历史现象时，对中国走向世界作了更深入全面的探索。

首先，孙中山认为，“救国救民”和“振兴中华”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走向世界。早在 1894 年他就认为“以中国之人民财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 20 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1905 年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他又指出：“将来我中国的国力能凌驾全球。”“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以执全球的牛耳”。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再一次强调“现在中华民国成立，得达共和目的，人人皆志愿已足。愚则以为未也，必使‘中华民国’立于地球上为莫大之强国而后快”。“振兴中国的目的，就在于把中国变成足以和西方各国并驾齐驱的国家”。并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协力，共策国家之进行，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做地球上第一等强国”。辛亥革命胜利后，他又多次指出：“如要数年，必有一庄严灿烂之‘中华民国’发现于东大陆，驾诸世界共和国之上矣”。“应有的志愿，……是要把‘中华民国’重新建设起来，让将来民国的文明和各国并驾齐驱”，“如果我们立志改良国家，万众一心，协力奋斗去做，……将来的结果，当然比美国更好”。显然，在孙中山看来，救国救民和振兴中华，其目的就在于使中国能以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世界上的强国，

与西方发达国家并驾齐驱。也就是说，孙中山把繁荣富强和独立自主看做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条件。这一认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同样具有积极意义。

其次，孙中山还明确地指出了中国走向世界的途径和方法。他认为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以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为原则建立了一个政治修明、经济富裕和人民安乐的民主共和国，以及实现交通运输、工业、农业、科技文化和国防事业现代化，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具体途径和基本方法。他曾明确指出：“革命党倾覆满清，其目的所在，欲使中国为世界最强之国，最富之国，又政治最良之国。”“我们现在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国家有了这样的纯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有了五权宪法，“乃可与世竞争，不致追随人后，民国庶几驾于外国之上”，并认为“中国能够实行这种政权和治权，便可破天荒地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在《建国方略》中，孙中山不仅论述了交通运输、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为中国勾画出了宏伟的蓝图，指出了实现现代化的具体途径和实施措施。应该说，孙中山的这些实现主张，既是对“世情”、“国情”的正确把握，又是爱国主义和世界意识的具体体现。

再次，孙中山能知亦能行。在中国如何走向世界这个问题，孙中山不仅作了理论上的阐述和方法上的探索，而且能坚持不懈地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一生。从创立兴中会、组建同盟会，发动10次武装起义，到组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制定各种改革法令和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发动“二次革命”，成

立中华革命党，到高举“护国”、“护法”大旗；从撰写《建国方略》，提出中国现代化的构想，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实行国共合作，主张北伐，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斗争，所有这些既是孙中山个性心理和务实精神全方位展现的过程，又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具体行为表现，更是为中国走向世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做的一种艰苦卓绝的工作。

尽管在孙中山的有生之年，由于这样或那样的环境和条件的限制，中国仍然没有获得独立自主和繁荣富强，走向世界的步伐也沉重而缓慢，但是，孙中山为革命和建设所做过的一切，却为中国走向世界，成为举世瞩目的强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引导中国走向世界——共产党人的战略抉择

中国共产党人一登上历史舞台，就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眼光，肩负起了让中国走向世界的使命和责任，做出了始终不懈地引导中国走向世界的战略抉择。

世界眼光就是普遍联系和发展的眼光。这是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的重要思想方法，是构成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思想的基本要素。马克思主义世界眼光导源于19世纪中叶马克思提出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在世界历史研究上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它提出了多少结论性意见和具体观点，更重要的是在于它提出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实现了方法论上的变革。这就是在考察社会时不能仅仅从一国的视野来考虑，必须同时具有世界的眼光。马克思早就预言过“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就是“世界历史”时代的产物和理论表

征，从一开始就具有打破狭隘的区域性，放眼宽广的世界性特征。这里所说的世界历史不是通常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史，即整个人类历史，而是指各民族、国家进入全面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制约，使世界“一体化”以来的历史。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以生产力和民族之间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基础的。随着商品经济、社会化大生产和交通工具的发展，以及国际交往的不断扩大，世界市场得以形成。由此，“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依存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①世界由此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确立“世界历史”的宽阔视野。这是马克思认识世界的特点，亦是他强调的根本观点。在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成熟以后的著作中，经常使用“世界性的”、“全球的”、“普遍的”、“宽广的”、“全面的”等概念，以同“氏族的”、“民族的”、“狭隘的”、“地方性的”等概念相区别，强调“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② 确立世界历史的胸怀和眼光，是“富有远见”、“目光远大”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本质之所在，唯有确立世界历史的眼光，无产阶级才有可能真正以主体的姿态投身世界历史大潮推进世界历史性事业。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眼光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在各种社会矛盾的相互作用下，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每一阶段都呈现出特定的时代特征，构成了某一阶段的历史规定性，反映为一定的

① 《马克思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时代主题。任何国家、民族要生存和发展，都必须对时代主题作出正确判断，顺应时代潮流，形成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策略。世界眼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走向世界的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观察中国，从而引领中国不断走向世界的过程。

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从不放过一切机会，让世界了解中国，努力使中国走向世界。为此，耗尽了他们毕生的精力。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毛泽东就表露了改造中国必着眼于世界的战略眼光。他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就指出：“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①在延安时代，为了打破国民党政府对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封锁，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存在和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毛泽东、周恩来，巧妙地抓住时机，通过外国人的笔，使中国的红色新闻飞向世界。1937年7月，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破天荒地会见了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谈话中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详细地讲述了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讲述了中国红军的创建与发展的历史，第一次正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对即将爆发的全面抗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郑重声明，欢迎蒋介石和共产党一起抗日。还应客人之邀，毛泽东第一次讲述了自己的生平。这些在当时都是头号特大新闻。四个月后，《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名为《西行漫记》）一书问世了。红色中国的真实情况，第一次公布于

^①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世。人们惊喜地发现，“原来还另外有一个中国呀！”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经斯诺先生介绍，宋庆龄女士的大力相助，先后有许多国际友人，冲破重重阻拦，长途跋涉，来到各抗日根据地。这些外国朋友，把他们在抗日根据地的见闻，写成通讯报道或专著，向全世界、全中国宣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存在和发展，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各项具体政策。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周恩来在国统区工作期间，曾利用一切机会开展外交活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主张，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对世界人民来说，以上这些也是他们了解中国人民、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开端。

1946年，美国派遣前国务卿马歇尔为特使来华，调处国共两党的争端。中国共产党指派周恩来作为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参加调处工作。这是中共第一次与美国高层军政要员接触。马歇尔赞赏周恩来卓越的外交风采，两人建立起较深厚的私人友谊。在调处过程中，周恩来曾多次严正指出国民党方面违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种种错误行为，以及各种欺骗手段。在大量事实面前，马歇尔也不得不表示对中共严正立场的同情与理解。1946年春，马歇尔还在张治中的陪同下访问延安，这些对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产生过一定的影响。随着中国政局的不断发展变化，进入1947年后，苏共高层领导人米高扬曾三次来到河北西柏坡村（中共中央所在地），与中共代表会谈。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方面的重要人士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也多次秘密出访苏联，交流情况，增进了解和信任。这是通过另一种渠道让世界了解中国。

新中国成立前期，中共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准备改善同美

国的关系。但由于美国想用称霸世界的手段来扼制苏联，消除所谓的“共产主义扩散”，更为了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1950年6月，发动侵朝战争，把战火一直烧到中国边境，并于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派海军第七舰队进驻我国的台湾省。这样中、美两国间和解的任何可能性都全部消失，中、美两国走向全面对抗。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以中朝人民的胜利而结束。经过朝鲜战争，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新中国的强大和不可战胜，极大地鼓舞了亚、非、拉地区正在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也进一步改善了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使整个国际形势进一步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中国人民的方向发展。在这种形势下，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正视中国的存在。

1950年2月初，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次访问除了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重大意义外，同样也起到了让世人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作用。1953年，周恩来总理出访印度和缅甸，在周总理的主动倡议下，确立了解决国与国之间争端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原则最终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并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绳。从而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了新中国的主张。同一时期，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禁运和封锁，为了使中国走向世界，由于美、英之间的矛盾，以及英国人急于想和中国做生意的心情，于1954年6月，首先同英国建立起代办级的外交关系。利用美、法之间的矛盾，1964年1月，又与法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不久，中国又与法国达成通航协议。这件事在当时意义十分重大，因为中国可以通过巴黎飞向欧洲与世界。这意味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孤立与封锁，实际上已被打破，中国的脚步，开始迈向世界。

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巨变，世界进入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时期。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这九个字，是周总理一次与外宾谈话中首先提出的。这时毛泽东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又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历史发展证明，毛泽东、周恩来对变化中世界局势的概括，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世界现实，其中尤以第三世界的提法，今天仍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后来逐渐演化为发展中国家之说，成为今天国际上通用的语言。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苏联在中国边境制造了“珍宝岛事件”，使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而中、美关系则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出现解冻的趋势。1971 年 4 月，继“乒乓外交”之后不久，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秘密使华，为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做准备。在基辛格动身的前一天，美国政府宣布，撤销对华贸易出口的限制，从而结束了长达 21 年之久的对华贸易禁运。1971 年 10 月 20 日至 26 日，基辛格第二次访问北京期间，发生了一件令世人瞩目的大事。在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上，以 76 票对 35 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定。蒋介石的代表立即被驱逐出联合国。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高高的飘扬在联合国大厦门前。1971 年国际间发生的这些重大事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多年来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科学制定和实施既定战略的结果。它预示着在国际社会中一种旧格局的破除和新格局的开始。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和十亿人口的中国，从此重新进入国际社会大家庭，他的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被世人所正式确认。中国已完全改变了几十年来加在自己身上的那种孤立、隔绝和被封锁、被包围的状态，从而走向了世界。

中、美两国建交，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而且对亚洲乃至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促使多极化的世界格局进一步形成，它对稳定亚洲和世界局势，对维护世界和平都有重大意义。对中国来说，中、美建交使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中国走向世界的道路，首先是由他们铺设的。这一点已刻印在历史之中，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从毛泽东、周恩来来说，他们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与手段，充分地让世界了解中国，尽全力使中国走向世界，从而取得了上面那些划时代的成果。

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向世界，正是适应这种和解与缓和的世界大潮，在前人铺路的基础上实现的。这里应当指出，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经过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者们的策划与指导，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有了重大突破和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什么毛泽东、周恩来时代，没能取得今天这样的丰硕成果呢？那是受到时代条件所限。分析这样的问题，必须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主客观条件出发，决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分析当时的形势，更不能苛求于前辈们。

20世纪80年代，历经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挫折之后，社会主义中国如何生存和发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的问题。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时，自觉地运用了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观点、方法和宽广的全球视野，在对当代世界历史时代特征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判断，提出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对外开放，自觉走进世界性或全球性交往的行列，因为“现在的世

界是开放的世界”。^① 只有对外开放，才能以人类的先进成果作为自己的发展起点，以跳跃式的发展跨入现代化的行列。所以，邓小平告诫我们：“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②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对外开放，做“世界公民”。邓小平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战略思想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的丰厚底蕴和宽广的全球眼光。这一战略的成功实施，引导中国从半封闭社会转向开放型社会，从而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并使社会主义在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再造辉煌。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达到了一个新的更高阶段，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为有机联系的整体，其标志是经济的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能否大跨步地走向世界，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成为决定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成败的关键。江泽民根据冷战后急剧变化着的世界形势，及时作出准确的判断，特别是利用冷战后大国关系调整的契机，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提出和实施与世界各国进行全方位协商与合作的战略，从而进一步改善和巩固了中国的睦邻、双边、多边及大国关系，使得中国与世界全面了解和接触，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扩大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

进入新世纪，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走向世界”。中国发展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也需要一个世界经济平稳而和谐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世界经济发展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中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64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78 页。

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依存度日益增加。因此，为适应中国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需要，必然要求提出与此相应的国际战略。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紧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紧密结合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顺应历史时代的潮流，进一步确定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要致力于实现各国和谐共处，致力于实现全球经济和谐发展，致力于实现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的建立和谐世界的新型战略构想。

中国与世界同行——新世纪中国国际战略的提升和完善

新中国建立后走向世界的历程，实际上是在中国逐步协调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过程中实现的。换句话说，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转变的背后蕴含着更为深刻的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和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在涉及现行的关于国际问题的政策和思想时，我们党和国家一般习惯称外交政策、对外政策，大多是事后对某种外交政策、外交思想的归纳和描述。而不是外交战略、对外战略，更少用国际战略。在党和国家的重要决议和报告中，都没有正式使用过“对外战略”、“国际战略”这样的字眼。这不等于是我们在国际问题上没有战略思想。事实上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都很重视战略问题，包括重视国际战略问题。在《邓小平文选》三卷中，“战略”这个词，一共出现了123次，其中一卷37次，二卷27次，三卷59次。在二、三卷的86次中，用于国际、外交、对外开放的有21次。其中，“国际战略”用了两次，“全球战略”用了4次。1998年出版的《邓小

平思想年谱》中，则至少有 13 处地方使用了“全球战略”的概念。

然而，在党和国家的重要和正式的文件中，为什么不使用“对外战略”和“国际战略”这样的概念呢？也许是长期以来中国的国力有限，还难以提出更具有全局性的战略谋划？也许是为了韬光养晦，避免在国际上过于张扬？也许作为战略，只能内部掌握，而不宜对外公开？也许是习惯性的用法使然，谁也没有主动地要去改变这样一个习惯？但无论如何，如果仅仅把我们的外交、我们的对外活动、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种种谋划，定位在“政策”层面，而不是“战略”层面，显然是低了。

使用不使用“国际战略”的概念，还只是一个引子或者形式问题。实质性的问题在于，无论我们过去有什么样的国际战略思想，进入 21 世纪，都面临着一个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竞争水平的问题。从这样的角度来说，21 世纪的中国不仅需要更加明确的国际战略，而且需要一个更加科学、更加完善、更能反映中国综合国力和外交水平、更能实现中国在国际上的战略意图和战略目标的国际战略。何以提出这个问题？其原因在于，今天我们所处的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维护利益和发挥作用的方式也有了相当的变化，相应的，对我们整个对外活动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了。

第一，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交通和通讯方式的巨大改进、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推进，整个世界已经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对外开放发展到新水平，中国将更加紧密地参与到世界经济的大系统中。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不仅仅限于传统的国境线之内，而是越来越多地体现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和磨合中，体现在国际组织的决议、条约和规则中，体